

份参加了葬礼。然后，灵车在礼炮哀乐声中驰往双城县。伪双城县政府又举行了县葬，尸体埋在县城南他私人地界内。

（摘自《长春文史资料》第22辑）

## 伪监察院长罗振玉

王国玉

### （一）

罗振玉，字叔言，号雪堂，祖籍浙江上虞，1866年8月7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阴县清朝的宦宦之家。4岁开始识字，5岁入塾读书，聪颖善悟，为塾师所惊异。15岁读完经书，下笔学作诗词，16岁学作八股文，考中秀才，进入县学学习。从此热心攻读经史考据之学，精心钻研金石文字。20岁写成《读碑小笺》，为著书立说之始。多年来他在甲古文研究和文物鉴赏方面卓有成就，著作甚丰，在学术上颇有贡献。

1890年，罗振玉24岁，入馆教书。30岁开始办报馆、办学堂。1896年在上海创立“农学社”创办《农报》。1899年创立“东文学社”。1900年秋，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，到武昌主持农务局。历任湖北农务学堂、江苏师范学堂、京师大学堂农科学校监督。1906年奉调进京入学部任二等咨议官，1909年补参事官，官居正五品。

罗振玉在政治上顽固复旧，恪守旧制，反对改革，仇视革命，忠于清室的立场异常坚定。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，革命形势席卷全国，清政府大势已去，无可挽回。罗振玉自命忠君不

凡，洁身引退，于当年12月初携眷属东渡日本，寓居于京都日中村。他把珍藏的清康熙皇帝书写的“云窗”两字横额悬挂在书斋正中，早晚瞻对，以示笃念大清王朝。

1915年，罗振玉在东京与宗社党骨干、清朝陕甘总督升允相识。他十分敬佩升允在辛亥革命后，率旧部与革命军顽抗到底，直至宣统皇帝下退位诏书之后才停止武力反抗，辗转至大连，渡海至日本东京。二人异国邂逅，相逢恨晚，推心置腹，志同道合，发誓复辟大清帝国。1916年宗社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巴布扎布蒙匪武装叛乱，打起勤王军的大旗，企图实现满蒙独立复辟大清帝国，只是没有多久，这次武装叛乱便被平息了。罗振玉甚是惋惜。

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，罗振玉萌生一种错觉，他认为要复辟大清帝国，依靠军阀和一些利禄之徒是没有希望的，需要依靠外国势力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
1919年，罗振玉携眷属由日本京都回国，初居于上海长乐里，不久迁至天津英租界集贤村。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鹤颐邀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。他以义不屈膝新朝，坚辞不就，著《古器物学研究议》答之。他在天津组织了东方学会，纠合封建余孽，等待复辟时机。

1922年12月，溥仪大婚，按照清朝旧制，一个实任五品官的罗振玉是不可能受到皇上“单独召见”的资格的。但是经升允面奏介绍居然受到溥仪的召见。罗振玉“蒙受皇恩”，向溥仪恳切倾吐衷情。溥仪“龙”颜大悦，破例准予罗振玉遇事可以随时上陈，“专摺奏事”，并赏赐溥仪手书的“真心古松”四字匾额和“福”字。罗振玉感激皇恩不尽，把溥仪的照片悬挂于室，逢人便大夸溥仪说：“皇上圣明天纵，将来一定是中兴令主。”于是更把自己的有生之年，完全寄托在溥仪身上，积极投

入复辟活动之中。

1924年9月，罗振玉应溥仪之召，入宫任南书房行走。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。罗振玉随同溥仪由醇王府逃往北京日本公使馆，继而逃往天津日租界，等待时机进行复辟。

1928年罗振玉携眷属定居于旅顺新市街扶桑町，幻想依靠日本势力伺机复辟。他在《集蓼编》中写道：“居辽以后，颇与日本关东军相往还，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，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；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治民望。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。”

## (二)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电召罗振玉于9月22日由旅顺来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。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“建立满洲独立的新政权”问题特意请罗振玉“赐教”。

罗振玉闻听，认为复辟有望，遂殷勤献策说：“欲谋东亚之和平，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；欲维持东三省的局势，非迎请大清宣统皇帝临御不能治民望。”

关东军的主意正是要把溥仪招出来充当傀儡，建立伪国家，板垣遂微笑着说：“罗先生之言极是，关东军所见与先生完全相同。如果吉林熙洽将军亦能如此洞察形势，深明大义，毅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，宣布独立，迎请宣统皇帝复位，回到满洲主持大计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罗振玉应板垣之请，于第二天清晨便急急忙忙去吉林诱降熙洽。正当熙洽对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威逼他宣布吉林独立，一时拿不定主意之时，罗振玉突然出现在熙洽面前。他向熙洽切切陈述：“格民，你可知晓？多年来你我梦寐以求复辟大清的宿愿就要实现了。这次我是专程由关东军司令部来到

吉林，就是为了皇上复位而来的呀！张学良蓄意炸毁南满铁路<sup>①</sup>惹起事端，日本关东军仗义出师，一举铲除民国政权，驱逐张学良势力，迎请皇上临御龙兴之地，大清国复国之日为时不远矣！格民，你我都是大清的臣子，况且，你又是大清朝皇族，理应不做民国之民，不为民国之官。而今时来运转，大清国复国之日即将到来，你又何必执拗地甘心朝臣于民国，不肯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政权脱离一切关系，宣布独立，匡复大清帝业，这岂不令人痛心疾首？”

熙洽默不做声，脸上已显露出十分激动的神色。罗振玉又絮絮地说：“驱逐张学良势力，拥戴宣统皇帝主持大计，乃复辟大清帝国千载一时之运，万万不可失也。”

熙洽连声说道：“叔言，多亏你明教于我，不失良机。不然的话我尚在迷雾之中，必误大事。关于多门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是可以商量的。今日我意已决，决心顺应时局，为复辟大清与日本通力合作，粉身碎骨也甘心情愿。”几天之后熙洽就在吉林抢先宣布独立，脱离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，得宠于日本侵略者。

到吉林后的第三天，罗振玉向熙洽说：“格民能以耿耿忠心不忘复辟大清帝业，实在令人敬仰。我不日就要离开吉林去往天津面禀皇上，以格民之大义，敬请皇上早下决心，临御大清龙兴之地，复辟帝业。不知格民有何代办之事没有？”

“叔言既然要去面谒皇上，事关重大，我也就不便留你在吉林多住了。复辟大清帝国乃皇上和你我等人日夜梦寐以求之大事，不可有分秒懈怠之意。怎奈我有公务在身，不能与叔言同去天津叩拜皇上，我欲写一奏折向皇上劝进，托付叔言代为面

<sup>①</sup> 是日军自己炸毁，制造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

呈皇上。”

罗振玉忙说：“格民想得周全，此意甚好，愿为效劳。”于  
是熙洽热情奔放，心神激动，伏案挥毫疾书，一气呵成劝进信  
交与罗振玉送交溥仪。

### (三)

9月30日，关东军派上角利一和罗振玉带着熙洽的劝进信  
来到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海光寺与溥仪秘密会晤，劝溥仪到  
东北“祖宗发祥地来主持大计”。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  
踞满洲，再图关内等等。溥仪听了，急着要去东北，遭到陈宝  
琛、胡嗣瑗、陈仁先的齐声劝阻。郑孝胥也主张“何时启驾，等  
佟济煦回来再定。”结果，溥仪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“暂不出  
行”的答复。罗振玉大失所望。

后来，溥仪派往东北探听消息的刘彥业回到天津向他转达  
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话：“俟“三省团结稳固，当由内田请上  
临幸沈阳。”于是溥仪来东北的心情更迫切了。1931年11月2  
日，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奉命来到天津，在静  
园会晤溥仪说：“请宣统帝早日动身，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  
达满洲。”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陪同下，于13日来到了鞍山汤岗  
子温泉疗养区，住在对翠阁旅馆，几乎与世隔绝。不久罗振玉  
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命向溥仪说：“臣正在与关东军军部洽商  
皇上登极之事。军部意见，事成之前不宜声张，望皇上深居简  
出，勿使外人窥见天颜，以免出现麻烦。”

溥仪听了心中不悦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七八天后，溥仪又被  
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。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溥仪搬进了  
肃亲王善善的旧居。

1932年2月6日是旧历正月初一，幽居旅顺的溥仪景况冷

冷落落，凄凄楚楚。为时不久，伪吉林省长熙洽派清室闲散皇族金名世来旅顺给溥仪送来2 000块闪闪发光的银元，做为臣子孝敬皇帝的贡礼，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报喜信。信中说满蒙各地首脑将于2月16日在盛京聚会，共议迎请皇上登极复位大事。

溥仪忘乎所以地喃喃自语：“啊，苍天啊！这一天可算盼来了！”2月19日接连传来了伪建国会议的消息：建立的新国家并不是复辟大清帝国，溥仪并不是重登皇帝的宝座。不久，板垣征四郎打来电话邀罗振玉、郑孝胥速去奉天议事。2月21日，罗振玉、郑孝胥由他们的儿子罗福葆、郑垂陪同来到奉天。板垣向他们说：“满洲建国绝非复辟大清帝国。清蒙建国会议已经决定建立与大清帝国根本无关的满洲国。新国家实行共和制，元首是执政，不是皇帝……”

罗振玉和郑孝胥闻听慌了手脚，急忙向板垣争辩，并且把土肥原贤二、上角利一在天津答应溥仪复辟的老帐一五一实地翻了出来，希望关东军履行过去的诺言。

板垣却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这已是关东军和满洲各地首脑及民众决定了的事情，是万万不能更改的了，希望不要固执己见，失去人心。”

罗振玉、郑孝胥还想据理力争，板垣却下了逐客令：“我们先谈到这里为止，下午我和二位分别地再敞开心扉谈吧。”

下午，板垣先会见罗振玉父子，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引诱罗振玉放弃复辟的打算。后来板垣发觉罗振玉的态度死硬，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，遂心中生厌，便结束了谈话。

随后，板垣又会见郑孝胥，他许诺郑孝胥以伪国务总理职位，使郑孝胥软了下来，答应回去之后要“接着板垣高参的指教，竭力劝导”皇帝，使之事成。

板垣见郑孝胥屈服了，于是便开始逼宫了。2月23日上午8时，他乘军用飞机在奉天机场起飞，直抵旅顺，下午与溥仪会晤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。第二天早晨，板垣让罗振玉、郑孝胥、郑垂、万绳栻转告溥仪：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。如果不接受，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，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。

溥仪听了腿一软，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罗振玉垂头丧气一言不发，万绳栻惊慌不安地站立在一旁，别人也不言语。郑孝胥说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的手掌心里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如索兴将计就计，以通达权变之方，谋来日之宏举。”

正当溥仪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罗振玉无可奈何地说，“事已如此，悔之不及，只有暂定一年为期，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，到时即行退位，看以此为条件，板垣还怎么说。”罗振玉的话既满足了关东军要溥仪作执政的要求，又给溥仪保留了希望。

溥仪曾回忆说：“我再没有办法，叹了一口气，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。”“过了不多时，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，说板垣已经同意……”

#### (四)

1932年3月9日，尽管溥仪对于未能复位登极当皇帝十分恼火，但在关东军的压力下还是充当了执政。郑孝胥却是高兴一时地喜气洋洋登上总理的宝座。罗振玉只得到个参议府参议的虚职，当然很不称心。这时他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。他既对“政体忽生枝节，事机不顺”，溥仪不能当皇上复辟大清朝郁闷不乐，深感“其错在离天津，此后乃必至之果”，后悔莫及只能“顿首自责而已”，又依恋不忍离开溥仪，遂又感到郑孝胥何济于事，迁怒于郑，移恶于郑。后来他痛则思痛，决意托病力辞

不就伪职，表示“皇上屈就执政，按理说君辱就该臣死，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”，表露出一股忠贞不屈之态。他“回到旅顺，仍是过他的蟬鱼生涯来遣日消忧”。

1932年末，伪监察院长于冲汉病故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劝解罗振玉出山继任伪监察院长，说：“郑孝胥虽然任国务总理，你任监察院长，无论大小日满官员，你都有弹劾大权，地位崇高，并不次于国务总理，这次绝不可推辞。”罗振玉在对武藤的旨意不敢拒绝和“不忍离溥仪左右”的心理下，于1933年7月5日勉强就任伪监察院长。这时溥仪虽然身为傀儡，尤其是1934年3月1日，溥仪成为康德皇帝，罗振玉虽然明知这和执政同样是大权操纵在日本人之手，但仍对溥仪复辟报有一线希望，真心实意地尽“佐理之责”。他在《就职宣言》、《再申告本院僚属文》、《警告内外百僚文》中提出“官邪尚未尽革”，监察院应该率先垂范，“必先正己，乃可正人”。“自古以来，人君不能独治，凡自有位皆负佐理之责”。“整躬率属，勤求治理，期如武侯之尽瘁鞠躬”。罗振玉幻想日伪官吏如同诸葛亮辅佐刘备那样辅佐溥仪。

罗振玉在伪监察院长任内，忠于职守，做了一些实事。伪满建国初期，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官吏实行收买政策，除正俸、各种津贴、公务费收入外，还另有所谓“特别手当”，金额很大，后来习以为常。罗振玉到职后，出于对溥仪的辅佐尽责尽力之心，发现这笔巨额开支，既不经国务会议，又不列入预算，而由所谓“第二支付金”支付，深觉惊异。他入宫面奏溥仪，请旨办理，溥仪明谕以前姑置勿究，今后必须截止。于是，罗振玉到国务院面见郑孝胥，必须从当月起截止支付第二支付金。郑孝胥唯唯应诺。

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受关东军利用，



许以可乘事变之机招财进宝，劫窃官财民物大饱私囊。罗振玉弹劾赵欣伯不能洁己奉公，种种违法已监察明白，据实纠参，并附加按语：大臣法斯小臣廉，未有源浊而能流清者，整饬纪纲，实应从大僚始。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赵欣伯已是拉完磨的驴，没有多大使用价值了，遂劝告赵欣伯辞职。

罗振玉还怕涉嫌伪国务院太上皇总务厅长远藤柳作，提出一项弹劾案是国都建设计划用款舞弊案，日本政府为了保持“满洲帝国监察权的尊严”，居然把舞弊的主持人远藤柳作撤职了。

在伪监察院长任内，使罗振玉更伤心难过的是一件与古董有关的事。他的日本属员品川主计告诉他，日本内阁某大臣很喜欢古董，不惜高价购买，要他把收藏的精品找出一些，可以卖一笔大价钱。他选择了保存多年的，不肯示人的精品铜器大小十几件，拿出来以为可以名利双收，交与品川。这批铜器运到日本后，便永无下文。后来品川辞职回国，仍然渺无音信。罗振玉曾派他的儿子到日本去要，品川支吾其词，始终也没能要回来，方知被品川所骗。

1935年，罗振玉70岁大寿时，溥仪特赏匾额一方，上书“朴学忠谏”四个大字。还特赐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乡学渊源追晦木”，下联是“朝瑞风谊抗寒松”。并赠寿佛、文绮、如意等物。

1937年5月7日，罗振玉辞去伪监察院长，回到大连养老。退休后依然深感不能匡复大清为憾事。他每年都要专程到伪都新京面谒溥仪一次，以尽事君之机，不忘君臣之情。

1940年6月19日，罗振玉留着清朝的辮子，含怨不能辅佐溥仪复辟大清，饮恨病歿。溥仪赏陀罗经被，赐祭桌料，赐谥，赐谥为“恭敬”。